

# “我讲述的并非其真实所为”：论《大伟人 江奈生·魏尔德传》对罪犯传记的改写

## “My Narrative Is [Not]... What He Really Did”: Fielding’s Parody of Criminal Biography in *The Life and Death of Jonathan Wild the Great*

贾彦艳 陈后亮 (Jia Yanyan Chen Houliang)

**内容摘要：**犯罪问题是菲尔丁小说中的一个常见主题。与一般罪犯传记作家不同，拥有法律知识背景的菲尔丁对犯罪问题的关注更深刻。在其代表作《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中，他对以往的罪犯传记进行了改写。他既没有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还原魏尔德的犯罪人生，也没有把他魅化成传奇英雄，而是运用强烈的夸张和讽刺手法，把魏尔德的犯罪过程当成反射整个英国社会罪恶的一面镜子，进而揭示犯罪的社会根源及其危害，使其成为最有社会批判意义的罪犯传记题材小说。

**关键词：**亨利·菲尔丁；罪犯传记；江奈生·魏尔德；改写；讽刺

**作者简介：**贾彦艳，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跨文化研究。陈后亮，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研究。

**Title:** “My Narrative Is [Not]... What He Really Did”: Fielding’s Parody of Criminal Biography in *The Life and Death of Jonathan Wild the Great*

**Abstract:** Henry Fielding’s fictions often revolve around the theme of crime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riminal biography writers, Fielding ponders more deeply into the issue of social crimes, owing to his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law. With his *The Life and Death of Jonathan Wild the Great*, he tries to make a parody of the traditional criminal biography. In this novel, he does not make a true account of what Jonathan Wild really did, nor does he romanticize his deeds; rather, he uses irony and makes the villain a mirror to reflect the corruption and evil of the English society, to reveal the root cause of social crimes, hence to make the book a criminal biography with very much cri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Henry Fielding; criminal biography; Jonathan Wild; parody; irony

**Author:** Jia Yanyan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Lecture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Her research area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Email: 2016210277@hust.edu.cn). Chen Houlia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His research area is literary theories (Email: chenhouliliang@hust.edu.cn).

## 引言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素有“英国小说之父”的美誉,被视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最重要的奠基人。与比他稍早一些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一样,菲尔丁在作品中也经常描写犯罪活动。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菲尔丁所生活的年代是英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罗伯特·华尔普(Robert Walpole)担任英国首相期间(1721-1742),政治极度腐败,法律形同虚设,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非常糟糕,导致各种犯罪活动猖獗。就像普拉姆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华尔普的时代粗俗、野蛮、下流,那是一个属于恃强凌弱者和奸佞之徒的时代”(Plumb 33)。其次,菲尔丁拥有司法知识背景,对犯罪问题有某种职业上的敏感。菲尔丁的外祖父是一名法官,他从小就在外祖父那里接触过不少法律书籍。长大后他又到伦敦法学院和荷兰莱顿大学学习法律,并于1740年获得律师资格。后来还担任了伦敦密德萨斯区的治安官。这样的司法学习和工作背景使他对犯罪问题有更强烈的兴趣,自然也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

从菲尔丁最初的政治讽刺剧《咖啡店政客》(1730),到后来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汤姆·琼斯》(1749)和《阿美丽亚》(1751),我们从中都可以看到他对犯罪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英国腐朽的司法制度的抨击。不过与当时流行的犯罪题材小说相比,菲尔丁所侧重的对象不是市井生活中的那些鸡鸣狗盗之辈,也不是有传奇色彩的江洋大盗,而是披着合法外衣却干着罪恶勾当的伪君子,特别是那些官员和贵族。菲尔丁在其早年的政治讽刺剧——特别是《堂吉珂德在英国》(1734)和《1736年英国纪实》(1737)——中曾辛辣嘲讽过英国上层社会的丑恶,并因此而得罪华尔普首相。后者旋即颁布《戏剧审查法》,禁止任何未经审查的剧目上演,最终迫使菲尔丁放弃戏剧舞台,转向小说创作。

在菲尔丁所有小说作品中,没有哪一部比《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The Life and Death of Jonathan Wild the Great*, 以下简称《魏尔德传》)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对英国社会的抨击。小说标题显示这是一部关于英国著名罪犯魏尔德的传记,但实际上菲尔丁不过是以此为托辞,借机表达他对整个英国社会从上到下各种犯罪行径的强烈讽刺。这部小说最初发表于1743年,收录在他的《杂文集》第三卷。由于华尔普首相此时已经下台,菲尔丁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小说中影射英国政府的种种腐败政治。

## 一、传统罪犯传记及《魏尔德传》的人物原型

自 17 世纪以来，罪犯传记（criminal biography）就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通俗文学题材。作家依据官方披露的犯罪档案，添加适量文学虚构，为读者勾勒出一个人如何逐渐堕落成罪犯、直至被处决的过程。其文学水准一般不高，主要的功能是寓教于乐，既满足读者——主要是收入有限的下层民众——对犯罪人生的窥视欲，又警示人们吸取教训，不要步其后尘。可以说，这样的罪犯传记虽然质量粗糙，模式化严重，难登大雅之堂，却对社会稳定起到一定的缓释阀的作用，因为它们既缓解了下层读者在剥削制度下的犯罪焦虑，同时又劝导他们做遵纪守法的安善良民。

十八世纪初期的英国仍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残酷的阶级剥削是资本积累的实质来源。大量的失地农民、无产者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工厂生产体系，他们失去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却只换来非常微不足道的收入。这种剥削制度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正义的。相比之下，挑战社会制度的犯罪活动反倒值得羡慕。所以在读到罪犯传记中的那些传奇化的虚构故事时，人们感受到的并非犯罪活动对正义秩序的践踏，反倒是对非正义秩序的反抗。况且早期的罪犯传记都有不少侠义色彩，描写的人物往往并非奸诈邪恶的暴徒，反倒是像罗宾汉那样劫富（未必）济贫的人，其犯罪手段相对比较“光明磊落”，喜欢在大路上拦劫过往富人。只要受害人愿意交出财物，一般不会受到为难。因此早期的罪犯大多都被称为“劫匪”（highwayman）。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约翰·盖伊（John Gay, 1685-1732）在其代表作《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 1729）中刻画的麦克西斯上尉。

虽然早期罪犯传记偶尔也会表达一些对英国社会腐败和不公正状况的不满，但这都是次要的，其重点还是为读者提供娱乐，外加稍许劝人向善的教化功能。几乎从未有哪部罪犯传记把社会批判作为主要目的。这可能也正是华尔普政府的审查法只针对菲尔丁的那些社会政治讽刺剧，却不针对罪犯传记的原因。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罪犯传记虽然质量粗糙，对社会来说却没有太大威胁，甚至还有一些好处。

与之前的罪犯传记相比，菲尔丁在《魏尔德传》中所要表达的东西却有很大不同。他的重点不再是还原魏尔德的人生经历，而是把他的犯罪过程当成反射整个英国社会罪恶的一面镜子。魏尔德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英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之一，为人奸诈，诡计多端，对正邪两道都十分熟络，善于操纵各方力量为己所用。在公众面前，他是威震全国的捕贼高手，惩恶扬善，维护正义。但实际上，他却串通政府和犯罪团伙，构建起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把形形色色的扒手、强盗、贼人都网罗到自己手下，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让他们为自己服务。如果有手下对他不忠或不听差遣，就会被他用计交给法庭惩处，最终成就自己“大不列颠及爱尔兰总捕头”的美誉。

所有赃物都由他处理，在获得一定酬劳后返回失主以便从中获利。因此，他常被很形象地戏称为“劫匪、入户盗窃犯、拦路贼和小偷联合会总经理”<sup>1</sup>。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魏尔德的成功很难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如此长期控制黑白两道而不被揭穿？但在十八世纪初的英国却并非不可能。一来，魏尔德为人极其狡猾，善用手段拉拢官员和控制手下。二来，当时英国的司法制度又十分不健全，没有建立完整的执法体系。窃贼如果不是被当场人赃俱获，受害人便拿他没办法。即使抓住了嫌犯，受害人还得自己向法庭支付一笔不菲的诉讼费用，才有可能让坏人得到惩处。再加上当时的法庭十分腐败，法官受贿、犯人串供的现象十分普遍。贼人很有可能反咬一口，让受害人陷入更大的麻烦。这在《魏尔德传》中也有所体现。善良的珠宝商人哈特弗利原本被魏尔德一伙害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在法庭上却又被魏尔德等人串通一气，差点陷害致死，实在是黑暗至极。由于诉讼成本太高，又不一定能获得正义的判决，很多受害人便转而求助于像魏尔德这样的民间抓贼人。他们表面上是在抓贼，实际上往往是在窃贼与受害人之间进行赃物返售交易的中介。正如摩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收售失物和赃物的人熟悉犯罪世界，有特殊渠道联络贼人。到1710年，抓贼已经成为一门很复杂的行当，涉及敲诈、勒索、行贿、告密和有组织行窃等”（Moore 60）。

也就是说，魏尔德事实上同时干了两桩生意。一是表面上抓贼除恶，二是背地里销赃获利，可谓名利双收。1720年前后，魏尔德的声誉达到顶峰。60多名贼人被他送上绞架，报纸上大肆宣传他的丰功伟绩，连枢密院也要向他征求治贼方略。但从1724年开始，魏尔德从自己的人生顶峰上迅速跌落。他先是在抓捕传奇大盗约翰·谢泼德（John Sheppard）的过程中屡遭戏耍，狼狈不堪，受到公众质疑和奚落，后又因策划手下越狱而东窗事发遭到逮捕。此后他又被众人背叛落井下石，他所犯下的各种罪行也被陆续揭发出来。恶贯满盈的魏尔德于1725年被判处绞刑。行刑当日可谓万人空巷，人们都想一睹为快，亲眼见证这位有史以来最大的伪君子的下场。魏尔德被绞死后，他的尸体还被送往英国皇家学院用于医学解剖，头颅则被展览数日，足见当时的人们对他的愤恨。

## 二、“我讲述的并非其真实所为”

作为名震一时的人物，魏尔德死后立即成为街谈巷议的对象，报纸上纷纷刊载与魏尔德案件有关的报道，罪犯传记作家们自然也不会放过如此近在眼前的话题人物。在魏尔德被处决后不到一个月，笛福就率先出版了《江奈生·魏尔德的生平及所为实录》（*True and Genuine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Ac-*

1 参见“The Life of the Famous Jonathan Wild,” [http://www.pascalbonenfant.com/18c/new-gate-calendar/lives\\_jonathan\\_wild.html](http://www.pascalbonenfant.com/18c/new-gate-calendar/lives_jonathan_wild.html). Accessed Jul. 20, 2016.

tion of the Late Jonathan Wild )。 <sup>1</sup> 笛福的作品基本沿用了一般罪犯传记的形式，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记述了魏尔德的一生，它的虚构成分较少，但文学价值也有限，只不过在叙述手法上更连贯、娴熟一些。相比之下，菲尔丁的《魏尔德传》显示出与以往的罪犯传记很多不同的地方。

在《杂文集》的前言部分，菲尔丁表明了自己的写作意图：

我不打算进入那些杰出的历史学家的行列，他们依据真实的档案记载，早已写出了让人满意的有关这位大人物的生平所为。对于这段历史的真实客观性，我毫无贬低之意。……坦率地说，我所讲述的并非他的真实所为，而是他应该做过、或者可以做的事情，并且对现实中的其他类似的伟大人物来说，这些事情也是适合他们干的。（Fielding “Preface”）

很明显，菲尔丁在这里借用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和史之间所作的区分：“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 81）。也就是说，菲尔丁的目的不是还原魏尔德的罪行，而是以他为典型，去再现和揭露普遍存在于英国、乃至任何人类社会的犯罪行为。他说：“我想提醒读者的另一点是，既然它并非对魏尔德本人的真实记述，同样它也不是为了再现任何一位别的什么人的特征。无耻的行为——而非某个无耻之徒——才是我想要表达的主题”（Fielding “Preface”）。虽然小说题目传达的信息是人物传记，但实际上它是为一切表面伟大、实则无耻之极的伪君子刻画的群像。正如法瑞尔所指出的，小说真正的讽刺对象“不是魏尔德，而是文明世界的同道中人”（Farrell 216）。

如果说在菲尔丁之前，罪犯传记更关注日常随处可见的“窃钩者”的话，那么菲尔丁则把目光更多投向了那些躲藏在历史阴暗处的“窃国者”身上。以前一种人相比，“窃国者”的手段更卑劣，对社会的危害也更大。但由于其隐蔽性强，而且人们往往又很幼稚地认为那些了不起的大人物也必定都是道德上的楷模，这就使得那些做了坏事的伟人们非但逃避了惩处，反倒欺世盗名，被人们冠以各种伟大称号，甚至名垂青史，这实在是讽刺至极。菲尔丁说：

很多非常无耻的作家常把新门监狱视为人性被去掉面具的地方，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相反，我倒觉得我们有理由把那些伟人所居的豪华宫殿看作不过是戴了面具的新门监狱。同样的行径，在一个地方换来

---

1 直至 21 世纪，仍然有以魏尔德为主要人物的新作品出现，比如英国作家大卫·里斯（David Liss）的小说《商业票据的阴谋》（*A Conspiracy of Paper*, 2000）。

的是不堪想象的痛苦和耻辱，在另一个地方换来的却是无上的荣耀和奢华，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一个诚实的人感到愤慨。（Fielding “Preface”）

借助魏尔德的故事，菲尔丁正是要揭露隐藏在伟人形象背后的“凶残、贪婪、掠夺、粗野、伪善和背叛”（Fielding “Preface”）。

在小说中，菲尔丁也不断在“窃国者”与“窃钩者”之间进行类比。魏尔德在亨利三世时代的祖先朗方格因盗窃罪被处绞刑，他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诗句：“法官老爷真无耻，

魏尔德扒了个衣袋就绞死；胡伯特跟他的同党盗窃国家物资，倒落得个逍遥自在，太平无事”（5）。在第一卷第五章，拉·鲁斯伯爵与魏尔德争论做官与做贼的区别。伯爵认为“做个大官总比当个小偷强”（15），劝魏尔德应把才能用在谋官上。魏尔德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生活中的共同之点是远多于一般人所想像的”（15）。相比之下，魏尔德认为做贼甚至强过做官，因为贼匪不过是从别人身上偷些钱财，至多只是对受害者个人造成伤害，而腐败官员却是辜负了公众的信任，破坏整个社会正义秩序。菲尔丁显然是借魏尔德之口，表达他对腐败上层社会的强烈批判。

### 三、对魏尔德人物形象的反传奇化塑造

为了强化小说对“伟人”的讽刺效果，菲尔丁在下说中故意丑化魏尔德的形象，而非像一般罪犯传记那样对罪犯进行传奇化处理。如前所述，在早期罪犯传记中，窃贼往往被塑造成有侠义色彩的人，是讲究“盗亦有道”的豪杰之士，即便像笛福笔下的女贼摩尔·弗兰德斯，在作案过程中也屡屡展现出机智果敢的形象。这样的犯罪人物容易唤起读者的同情和代入感。反观菲尔丁笔下的魏尔德，他不是聪明，而是奸诈；不是果敢，而是狠毒；他做人两面三刀，出尔反尔，诡计多端，越是对他有恩、和他关系近的人，越容易成为他下手的目标。拉·鲁斯伯爵和白格沙特原本都是他的亲密同伙，多次合谋作案，却也免不了被他所害。他最擅长的手段便是“先用一个爪牙去骗人，然后再骗行骗的爪牙的双料骗局”（47）。哈特弗利是魏尔德的同学好友，对他多有恩惠，魏尔德却恩将仇报，用卑劣手段对恩人一再施害，差点让其送命。

早期罪犯传记经常会设置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以便增加犯罪人物的魅力。比如让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完成惊天大案，或是机智勇敢的逃脱追捕，化险为夷等。菲尔丁原本也为魏尔德设计了类似的桥段。比如在小说第二卷第十至第十三章，魏尔德在拐骗哈特弗利太太去往海外的途中，被人识破诡计后遭到放逐。当他独自在海上漂流的时候，并没有展现出任何属于英雄人

物的品质，只知道诅咒和谩骂，甚至连自杀的勇气也没有。侥幸被过往船只搭救后，他反过来立马又盘算起如何劫夺这只船上的财物。其卑鄙无耻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

与以往罪犯传记的主角相比，魏尔德最大的特点还在于，他是第一位真正的有组织犯罪领导者。按照盖里奥提的定义，所谓“有组织犯罪”（organized crime）指的是“在传统的合法社会结构之外运作的一种持续性犯罪活动，成员按照一定的等级制度相互合作，通过犯罪行为为个人谋取权力和利益”（Galeotti 6）。当然，很多犯罪活动都不是一个人完成的，经常需要多人联手作案。笛福笔下的弗兰德斯就经常在作案过程中寻找帮手，特别是与她的保姆一起合作了好多年，她们可以相互掩护，或者协助销赃等。但这种合作还算不上是有组织犯罪，而是一种相互有利的结盟；她们之间只有合作关系，没有等级关系。有组织犯罪的两个最重要特点就是等级严格和成员众多，就像电影《教父》中所描绘的黑社会一样。虽然魏尔德本人作案手法也十分娴熟，但他最擅长的还是操纵别人为自己谋取利益。他说：

想做伟人只消结成一个帮，叫这帮里的人都听我使唤。帮里的人抢来的东西全都得归我，任凭我随便给他们一点点酬劳。在帮里，我提拔胆量最大、心肠最狠的那些人，其余的遇到机会我就随便叫他们去充军，或者送上绞刑架。这样，本来是保护并裨益社会的法律就为我一个人利用了。这就是一个贼匪最大的优点。（40）

如前文所述，这种组织化犯罪的形成与当时腐败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也是整个社会腐化的缩影。魏尔德就是他所建立的犯罪王国的最高统治者，“纠合了一大帮喽罗，里面有败落的赌棍、破产的衙吏、亏空的买卖人、游手好闲的学徒、律师的助手和一些胡作非为的浪荡少年”（59）。诱骗和恐吓是魏尔德最主要的控制手段。虽然手下人对他的剥削多有不满，但也不敢背叛他，因为稍有不忠便会被他遭到清洗。

魏尔德的犯罪组织之所以能长期存在，除了他在内外控制上很有手腕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英国腐败、混乱的司法状况。一方面，由于还没有建立专门的警察执法队伍，没有人能对他这种庞大的犯罪网络进行调查或打击。其次，有组织犯罪在当时还是新出现的犯罪形式，当时的法律在应对这种犯罪方面还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当魏尔德最终被布留斯金的盗窃案牵连归案后，法官们竟然一时拿他没办法。直到后来议会专门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凡利用别人的手去盗窃的贼，应处以死刑”（124），魏尔德才算得到应有惩罚。

早期罪犯传记在结尾处有两个常见套路。一是让罪犯在临刑前接受牧师劝导，表达一段真诚的忏悔，以便告诫他人不要步其后尘。二是描述罪犯在

临刑前的无畏，以显示其豪杰气概。这两个套路在《魏尔德传》中都有体现，不过菲尔丁有意对它们进行了改写。面对牧师的劝导，魏尔德充耳不闻，毫无悔意。面对即将到来的绞刑，他也尽量显示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然而这不过是一种伪装。其实外强中干的他内心非常惧怕死亡，甚至想通过吞食鸦片自尽免于绞刑。更滑稽的是，他最终被绞死的时候，还顺手从身边的牧师身上偷走一只开瓶塞的钻子。这一毫无意义的举动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个非常猥琐、卑劣、可笑的人物形象。

### 结 语

法瑞尔曾认为：“菲尔丁的这部传记在技巧上更接近传统的伟人传记，而非当时的罪犯传记”（Farrell 216）。他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就是因为菲尔丁对传统罪犯传记做了很多改写。他的《魏尔德传》不是一部单纯的罪犯传记，而是通过对这种流行题材的改写，实现了对英国社会腐败状况的深刻揭露。虽然有不少人认为这部小说的主要意图是用魏尔德的无耻来讽刺一切伟人的虚伪本质，但我们也应当承认小说的另一重要价值就在于，菲尔丁通过魏尔德的故事，为读者揭示了组织化犯罪的根源及其危害。普通读者从罪犯传记中看到是传奇，而拥有法律知识背景的菲尔丁更关心的却是犯罪与社会腐败之间的关系。在这部小说发表7年之后，菲尔丁被正式任命为伦敦密德萨斯区治安官。他在任期内（1748-1754）设立了英国最早的全职警察队伍，成为后来著名的弓街侦探的前身。此外在1751和1753年，菲尔丁还先后出版了两本小册子<sup>1</sup>，专门探讨犯罪预防和社会治理问题，使其成为犯罪预防学的先驱。正是由于这些功绩，鲍艾尔才称赞说：“作为治安官的菲尔丁对英国法律的改造，和作为小说家的菲尔丁对英国小说的改造同样彻底”（Boyer 206）。至少在二十世纪以前，我们很少见到还有谁能像菲尔丁这样，把司法实践和犯罪主题文学创作结合的如此紧密有效。

### 【 Works Cited 】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Aristotle. *Poetics*. Trans. Chen Zhongmei. Peking: Commercial Press, 1996.]

Boyer, Allen. "Justice Fielding, the Novel, and the Law." *Yale Journal of Law & the Humanities*, 1992(1): 187-207.

Farrell, William. "The Mock-Heroic Form of 'Jonathan Wild.'" *Modern Philosophy*, 1966 (3): 216-226.

1 这两本小册子分别是《针对近来劫匪增多的原因的调查及抑制恶势力增长的几条补救措施》（*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Late Increase of Robbers &c. with Some Proposals for Remedying the Growing Evil, etc.*）以及《关于有效救济穷人，改善其道德状况，使其成为有益社会成员的建议》（*A Proposal for Making an Effectual Provision for the Poor, for Amending their Morals, and Rendering them useful Members of the Society, etc.*）。



Fielding, Henry. “Preface to *The Miscellanies and Poems of Henry Fielding, Esq.* (1743).”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Preface\\_to\\_the\\_Miscellanies\\_and\\_Poems](https://en.wikisource.org/wiki/Preface_to_the_Miscellanies_and_Poems). Accessed Oct. 15, 2016.

亨利·菲尔丁：《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萧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年。

[Fielding, Henry. *The Life and Death of Jonathan Wild the Great*. Trans. Xiao Qian. Nanjing: Yilin Press, 1997. ]

Galeotti, Mark. “Criminal Histories: An introduction.” Ed Mark Galeotti. *Organised Crime in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9.

Moore, Lucy. *The Thieves’ Opera*. London: Penguin, 1997.

Plumb, Joh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0.

责任编辑：李敏锐